

社会资本与政治态度： 新加坡三大族群比较研究

孔建勋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东南亚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 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新加坡的公众价值观调查(WVS)数据表明,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有明显的差别,而且社会资本对于新加坡 3 个族群的政治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新加坡 社会资本 族群 政治态度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 (2009) 02—0061—05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词最早由 Lyda Hanifan 于 1916 年提出,但未产生较大影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才使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科尔曼(Coleman)、帕特南(Putnam)以及林南(Nan Lin)等从各自的研究视角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并确立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其中最经典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其最大的贡献是突出了社会资本的集体属性,从集体、社区乃至国家的不同层面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于促进社区治理、社会和谐、族际团结、民主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性。

在西方学术界的社会资本研究中,族际差异始终倍受关注。根据现有的主要英文文献来看,在多民族的西方社会,社会资本主要用来解释就业获取、就业声望、社区发展、社会流动、政治参与、健康福利以及社会剥夺等诸领域的族群差别,近年来族群的自我认同问题也开始成为社会资本研究的前沿^[2](P137~174)]。

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中文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评述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3]~[4]};二是运用林南的理论范式,研究嵌入在网络资源中的社会资本对个人职业获取和声望提高方面的影响^{[5]~[7]}。但很少有国内学者运用帕特南的理论范式来研究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问题。另一方面,国内也已经有不少关于新加坡的族群问题与族际关系的研究文献^{[8]~[10]},这些文献从基本上都侧重于描述现状和政策。此外鉴于数据和方法的局限,鲜有文献涉足族群差别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按照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范式,利用新加坡公众价值观调查数据(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于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 www.worldvaluessurvey.org,特此致谢),着重考察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三大族群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的差异程度,及这 3 个族群的社会资本存量如何影响其政治态度。

一、数据描述和分析方法

新加坡的公众价值观调查(WVS)是通过分层随机抽

收稿日期 2008—10—21

基金项目 本项研究得到 200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 J06XMZ052)的资助。

作者简介 孔建勋(1970~),男,彝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所副研究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样技术确定的,通过面对面访问,成功收回有效问卷 1,512 份,回收率为 79%。有效问卷数据在 95%的置信区间水平下,正负误差 2.0%。此次调查的加权因素在样本设计阶段就已经确定族群差别,而在实地访问过程中也考虑了年龄的加权因素。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因此首先通过族群变量,排除那些不属于这 3 个群体的观测值,最后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数为 1,433 个。从个人基本特征来看,在这 1,433 个观测值中,华人占 45.22%,马来人 30.98%,印巴人 23.80%;男性 47.80%,女性 52.20%;15~24 岁的有 35.24%,25~34 岁的 21.14%,35~44 岁为 21.07%,45~54 岁的有 13.54%,55~64 岁为 5.30%,65 岁以上的有 3.21%。

从经验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来看,西方社会学界从邻里接触、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以及社团组织活动 3 方面来测量社会资本^[1]。在新加坡的公众价值观调查问卷中,有两组问题分别询问受访者非正式的社会交往网络,以及参与志愿者组织活动的情况。因此,本文根据这两组问题设计 3 个族群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志愿者组织活动两种社会资本的变量。

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过时间利用 (time use) 的方法来测量受访者花多少时间与 5 类不同群体的人交往,量表赋值分别为“几乎每周”、“一两个月一次”、“仅一年几次”和“从来不”,通过相关分析 5 个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将 5 个问题加总生成一个定序变量作为非正式及交往网络的社会资本,赋值依次表明是否参与和参与的频度。社团组织活动的社会资本则通过询问受访者当前是否参加 14 种类型的志愿组织活动中的一种或多种^①,回答为二分的“参与”或“不参与”。相关分析这 14 个问题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将它们加总生成一个定序变量作为社团活动的社会资本,赋值依次表示是否参与或者参与组织的个数。另外,将族群变量重新变成虚拟变量,以华人为参照组,生成“马来人”和“印巴人”两个虚拟变量。由此,本文首先将两种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通过族群变量来考察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为了控制个人基本特征的干扰,同时也为了考察个人基本特征对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性别、年龄、学历、阶层和收入等几个变量也被列入分析。由于两个因变量都是定序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ordinal logit 回归模型来测量社会资本存量及族群差别。另外,把年龄、教育

程度、月收入、社会阶层等几个特征重编并转变为虚拟变量,各自变量的参照组分别为 15~35 岁年龄组、小学文化及其以下、2,000 新元以下的最低收入组以及社会底层(如表 1 所示)。

在分析社会资本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方面,本文使用了两组问题。第一组询问受访者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由 3 个变量构成:一是日常生活中政治的重要程度,赋值依次表示“根本不重要”、“不太重要”、“有点重要”以及“非常重要”;二是与人交流时是否经常讨论政治话题,根据其观测值的频数分布特点,使之变成赋值为“是”与“不是”的二分变量;三是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赋值依次表示“跟本不感兴趣”、“不太感兴趣”、“有点感兴趣”以及“非常感兴趣”。由此本文分析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将这 3 个变量作为因变量,而前述的两种社会资本转变为自变量,与表示族群的虚拟变量一起进入模型,考察按族群划分的社会资本存量对政治态度的影响,同时控制并解释个人基本特征因素对政治态度的影响。由于第一、三个自变量是定序变量,因此采用 ordinal logit 回归模型,而第二个是二分类(binary)变量,因此采用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见表 2)。

另外一组考察政治态度的问题询问对当前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看法,这 3 个变量分别表示:(1)新加坡由不受国会和选举限制的政治强人来领导;(2)专家(而不是政府)来做出最有利于国家的决策;(3)新加坡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这 3 个变量的赋值依次是“非常不好”、“很不好”、“很好”以及“非常好”。本文分析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将这 3 个定序变量作为因变量,来考察社会资本变量和族群变量对政府治理模式的看法和态度,个人基本特征的几个变量都进入分析模型,一方面控制这些特征对社会资本和族群变量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同时考察这些特征对政府治理模式的解释能力。由于 3 个因变量都是定序变两,因此都采用 ordinal logit 回归模型(见表 3)。

三、社会资本族群差异及其对政治态度的影响

如前所述,社会资本已经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继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重要资本形式,因此无论从个体层面还是社区、社会的集体层面,它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多民族的国家,社会资本在族

①调查问卷中测量社会资本的问题限于篇幅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数据中心或与笔者联系。

群差别的表现如何呢？

表 1 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社会资本存量的 ordinal logit 回归系数

		模型一:非正式网络社会资本		模型二: 志愿组织活动社会资本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族 群 (参照华人)	马来人	.540***	.117	.550***	.141
	印巴人	.702***	.127	.459**	.149
性别 (参照女性)	男性	.600***	.096	.092	.112
年龄组 (参照 15~35 岁)	36~55 岁	-.650***	.105	-.575***	.125
	56 岁以上	-1.013***	.186	-.871***	.238
教育程度 (参照小学及以下)	中学程度	.385***	.114	-.287*	.132
	大专及以上	.551**	.196	.117	.216
家庭月收入 (参照 2000 新元)	2000 ~4999 新元	.419***	.116	.179	.138
	5000 ~7999 新元	.605***	.176	.486*	.203
	8000 新元	.690***	.183	.406	.216
主观阶层 (参照社会底层)	劳工阶层	.964***	.237	.647*	.317
	中下层	.570**	.236	.610	.316
	中上层	.862***	.244	1.110***	.320
	上层	.840	.480	1.499**	.557
Prob>chi2		0.000		0.000	
N		1,048		1,433	

注：***P ≤ 0.001; **P ≤ 0.01; *p ≤ 0.05

(一) 社会资本存量的族群差异

表 1 为我们提供了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的经验数据。先来分析非正式网络的社会资本存量，模型一的回归系数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主观社会阶层等诸多个人基本特征的影响以后，回归模型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首先，相对于华人而言，马来人和印巴人的网络社会资本存量更高，尤其是印巴人。其次，所有进入模型的个人基本特征因素都对非正式网络社会资本具有明显的影响，按性别来看，男性的社会资本存量比女性多；从年龄结构来看，年龄与社交网络社会资本呈负相关，中老年组的社会资本存量最低，而 15~35 岁年龄组的存量最高；而教育程度与非正式交往的网络社会资本存量呈正相关。类似地，从家庭收入组的系数来看，相对于来自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家庭的观测值，其它组的社会资本存量明显高，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社交网络社会资本存量也有显著的增长。然而

从主观社会阶层变量来看，尽管那些自认为属于社会最低层的人，社交网络社会资本最低，但社会资本存量与主观阶层并没有出现正相关的态势，相反，劳工阶层的社会资本存量明显超过了中下层、中上层和上层（“社会上层”只有 16 个观测值，故显示统计不显著）。

再从模型二的回归结果来看，在不受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主观阶层等个人基本特征的影响的情况下，族群因素对于参与志愿组织活动的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与上述社交网络的社会资本相似，马来人和印巴人在志愿组织活动的社会资本存量方面也超过了华人。但与交往网络略有不同的是，马来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社会资本存量多于印度人。与社交网络的社会资本不同的是，并非所有的个人基本特征都对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社会资本存量具有解释力。一方面，年龄和主观阶层的影响比较明显，与模型一相似，中老年以上的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最少，15~35 岁年龄组的人参与最多；收入与志愿者活动也成正相关的态势，中上层和上层参与志愿者活动最多，社会底层最少，但中下层不具统计显著性。志愿者活动的社会资本基本没有任何的性别差异；从教育程度来看，中学学历的受访者比小学学历及其以下的人更少参加志愿者活动，但大专及其以上的学历不具统计显著性。收入水平的解释能力也非常有限，只有家庭收入在 5,000 至 8,000 新元的人显著地比最低收入阶层的人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志愿者组织活动。

表 2 社会资本对政治关心程度的影响回归系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志愿组织活动社会资本		.348	.984**	.850***
非正式网络社会资本		.481***	.436**	.435***
族群 (参照华人)	马来人	-.083	.276*	.185
	印巴人	-.619***	-.680***	-.164
性别 (参照女性)		.224*	.343**	.300**
年龄组 (参照 15~35 岁)	36~55 岁	.122	.007	.178
	56 岁以上	-.344	-.357	.087
教育程度 (参照小学及以下)	中学程度	-.021	.762***	.265*
	大专及以上	.002	1.600***	.513*
家庭月收入 (参照 2000 新元)	2000~4999 新元	.080	.140	.121
	5000~7999 新元	-.060	.207	.172
	8000 新元	.158	.497*	.295
阶层 (参照社会底层)	劳工阶层	.328	-.289	.425
	中下层	.201	-.259	.284
	中上层	.324	-.109	.366
	上层	.422	-.918	.179
constant		-.531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N		1,400	1,407	1,404

注：模型一、二 ordinal logit，三 logit regression ***P≤0.001; **P≤ 0.01; *p≤ 0.05。

(二) 社会资本对政治态度的影响

前面已经分析了新加坡 3 个族群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的差异,现在来分析社会资本对 3 个族群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

表 2 显示了社会资本以及个人各项基本特征对政治关心程度的影响。首先看两种社会资本形式的影响,在排除了族属、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以及主观社会阶层等几个基本的个人特征的干扰之后,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都对人们的政治关心程度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相比之下,志愿者活动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关心程度的影响更加明显,尤其是他们更加愿意讨论政治话题,并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对政治重要性的统计不显著 而非正式的社交网络社会资本对于 3 种类型的政治关心程度都基本上具有大致相当的影响力,其中对政治重要性的影响相对突出,而对谈论政治话题和对政治兴趣的影响基本一致。

按族群来看，在控制个人特征干扰因素的情况下,马来人的政治关心程度与华人差异不大,只有在谈论政治话题的时候比华人略多一些 相对于华人而言,印巴人明显地认为日常生活中政治并不重要，并很少讨论政治议题。此外，进一步分析个人基本特征的回归系数不难发现,性别特征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政治对男性更重要,他们也更多地讨论政治话题,对政治比女性更加有兴趣 政治重要性教育程度无关,但学历越高,就越喜欢讨论政治议题,也越对政治感兴趣。但无论是家庭收入、社会阶层还是年龄，都不能影响政治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谈论政治话题以及对政治的兴趣。

(三) 社会资本与 3 个族群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态度

从表 3 的这 3 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在排除了族群和个人基本特征的干扰之后,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比对政治关心程度的影响要弱一些。具体来看,越是积极参与志愿组织活动的人,也认同专家(而不是政府) 决策,也越认可建立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与此不同的是,那些拥有更多非正式的社交网络资源的人,也更加倾向于赞成国家由政治强人来领导,也更加认同专家(而不是政府) 决策。

在其它个人特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族群属性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也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相对于华人而

表 3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态度 ordinal logit 回归系数				
		由不受国 会和选举限 制的政治强 人领导	专家(而 不是政府) 来做 政策决策	建立更加 民主 的政治 制度
志愿组织活动社会资本		.211	.740**	.650*
非正式网络社会资本		.502***	.447***	-.091
族群(参照华人)	马来人	-.778 ***	-.409**	-.211
	印巴人	-.230***	-.313**	-.798***
性别(参照女性)		-.320**	-.235*	-.020**
年龄组(参照 15 ~35 岁)	36~55 岁	-.034	-.116	.013
	56 岁以上	-.257	-.004	.021
教育程度 (参照小学及以下)	中学程度	-.036	-.015	-.168*
	大专及以上	.499 *	-.067	-.092*
家庭月收入 (参照 2000 新元)	2000~4999 新元	-.321*	.090	.296*
	5000~7999 新元	-.340	.125	.462*
	8000 新元	-.312	.022*	.033
阶层 (参照社会底层)	劳工阶层	.462	.066	-.037
	中下层	.095	-.562*	-.300
	中上层	.611*	.030	-.114
	上层	1.153 *	.162	.315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N		1,345	1,340	1,365

注 ***P≤ 0.001; **P≤ 0.01; *p≤ 0.05
言，印巴人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反对由政治强人来领导国家,而马来人的反对态度则更加强烈 在是否由专家(而不是政府) 来决策的问题上也是一样的态度,相对于华人来说,印巴人表示反对,而马来人反对的程度也更强烈一些。但是在新加坡是否建立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上,马来人的变量不具有解释能力,而印巴人则超乎寻常地表示赞同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

在个人特征的影响方面,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加不认同国家由政治强人来领导和专家决策,但在是否应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方面,性别差异较小。另外,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和主观社会阶层几个变量对 3 种政治态度具有微弱的影响,但年龄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态度及基本没有任何影响,这与前述的政治关心程度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新加坡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巴人这三大族群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比较马来人和印巴人发现,前者在志愿者组织活动的社会资本存量高于后者,在非正式交往网络社会资本方面少于后者。但是，相对于华人而言，前述二者都更加活跃于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同时也更加愿意参加志愿者组织的社会活动。本文认为，马来人和印巴人在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明显不如华人,因此比华人更愿意投入非正式的交往和志愿者的社团

活动,尽可能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弥补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不足。

对于政治的关心程度以及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态度,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存量基本上都显示较强的影响力,那些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人,也更加认同政治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更加愿意谈论政治话题,也对政治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们也基本认同国家由政治强人来领导以及专家决策治国。

从个人基本特征来看,可以说性别始终具有较强的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参与非正式的社会交往网络(尽管参与志愿者活动方面不得而知),也更加关心政治,但比女性更加抵制政治强人的领导和专家治国。此外,其它各项个人特征对于非正式交往网络社会资本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于志愿者活动的社会资本存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于政治态度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需指出的是,由于本文使用的 WVS 是横剖数据(cross-sectional data),因此不能像追踪数据(longitudinal data)那样对新加坡 3 个族群的社会资本存量及其对政治态度的影响进行跨时间的比较研究。数据结构的另一个限制是,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非正式的社会交往网络不能确定有无族际交往以及交往的频度。此外,限于篇幅,本文只针对新加坡国内的三大族群进行比较研究,但对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进行跨国政治态度的比较研究也很有学术意义,随着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的

WVS 调查数据陆续公布,这样的跨国研究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 [1]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Putnam, R. D. E Pluribus Unum: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2006 Johan Skytte Prize Lecture [J].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07, 30, (2).
- [3] 周红云. 社会资本 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 *经济社会制度比较*, 2003, (4).
- [4] 赵延东. 社会资本理论的新进展[J]. *国外社会科学*, 2003, (3).
- [5] 王卫东. 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与个人资本[J]. *社会学研究*, 2006, (3).
- [6] 赵延东. 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 效用与局限[J]. *社会学研究*, 2002, (4).
- [7] 赵延东. 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一个经验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 (2).
- [8] 刘稚. 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与民族关系[J]. *世界民族*, 2000, (4).
- [9] 谢宁. 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J]. *世界民族*, 1995, (2).
- [10] 韦红. 新加坡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 多元一体化[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1).
- [11] Li, Y., Pickles, A. & Savage, M.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trust in Britain[J]. *European Sociology Review*, 2005, 21.

[责任编辑 杜雪飞]